

略论儒家思想对唐友谊诗的影响

熊晓燕

一、儒家思想在唐友谊诗中的表现

从先秦诸子百家蜂起之时,儒家就以其人本思想在诸家中独领风骚,由于儒家思想的主旨是“仁”与“义”,“仁”即“爱人”,讲求和睦友爱的人伦关系,同时也讲等级差别,要求不同等级的人具有不同等级的“仁”与“义”。“义”指一种人在社会中的道德行为准则。《论语·述而》讲到“义”曰:“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儒家宣扬的这种道德至上和等级差别的思想非常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因而虽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时衰时荣,但始终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在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在魏晋六朝的谈玄风气下奄奄一息,只有到了隋唐时代,才又重新崛起。特别是到了唐代,为了维护统一的大帝国的需要,唐统治者在积极复兴儒学的同时,又吸收了佛教和道教,并称“三教”。在整个唐代社会发展中,虽然佛、道二教也曾凌驾于儒学之上,但儒家思想对于唐统治者和唐文人来说一直是正统思想,它在唐代诗歌特别是唐友谊诗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交友之道是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方面,儒家把交友看作是信、义的表现,因为儒家把“恭、宽、信、敏、慧”作为一个具有“仁”的人最起码应该具备的“五行”,所以与人忠信是交友的标准,这种友谊观其实也是儒家思想主旨“仁”的一方面的具体表现。《论语》中有许多关于儒家交友之道和择友标准的论述,如“曾子曰:‘吾日三省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①“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②这可以说明“与人忠”是“仁”的一个方面。又如“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③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④对择友标准作了阐发。

儒家的友谊观在每个唐诗人的作品中都有表现,唐代友谊诗可以分为四大类。各类友谊诗都有儒家思想光点的闪耀,诗中所表露出来的友人间真挚的情感使友谊诗和山水诗、边塞诗一样成为唐诗的一大特色。

第一类是同僚间的友谊诗。唐代的官吏大多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的文人,漂泊流离的宦游生活促使许多诗人用诗向同僚表达那种共同感知的人生滋味。这类诗在唐友谊诗中占的比例较大,以赠别和唱和为主。如王勃著名的诗名:“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这类诗作的代表,骆宾王的《送刘少府游越州》,陈子昂的《送魏兵曹使^崔州得登字》,王昌龄的《重送裴郎中贬吉州》,李白的《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寄崔侍御》等及其他许多诗人的这类诗作在《全唐诗》中也是数不胜数。这类诗中表现出来的同是沉浮宦海的友人

之间的真挚的感情,是儒家“与人忠”和“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⑤的交友之道的体现,同时诗中所表现出来的离别的氛围不再是凄清而是悲壮和鼓励,打破了唐以前诗歌中表现离别情怀的“小儿女情态”的风格,体现了儒家提倡的“刚健”风格,使人们感到同僚之间的分别充满依恋的同时又有着对友人的希望和鼓励,表达了唐代诗人内心“自强不息”的情感。

第二类是师生间的友谊诗。儒家提倡“尊师重道”,这也是儒家刻意强调的人伦关系和具有等级差别的仁爱思想的一个方面。这类诗在唐友谊诗中的数量不多,以韩愈为主要代表。韩愈曾痛惜当时天下师道不兴,作《师说》以警世人,并顶住当时不尊师的逆流亲为人师。韩门师生之间有着亲密的友谊。《唐摭言·卷四·师友》曰:“韩文公名播天下,李翱、张籍皆升朝,籍北面师之。故愈答立之书曰:‘近有李翱、张籍者,从予学文’。翱与陆惨员外书亦曰:‘韩退之之文,非兹世之文也,古之文也;其人非兹世之人,古之人也。’”韩愈作《送李翱》:“广州万里途,山重江迤迤。行行何时到,准能定归期。揖我出门去,颜色异恒时。虽云有追送,足迹绝自兹。人生一世间,不自张与驰。譬如浮江木,纵横岂自知。宁怀别时苦,勿作别后思。”其中包含着的不仅仅是老师对学生的爱护,更多的是知己远别时款款深情和依依眷恋。张籍在贞元年间,“初至长安,谒韩愈;一会如生平,叹才名相许,论心结契。愈力荐为国子博士,然性狷直,多所责谏于愈,愈亦不忌之。”^⑥韩愈欣赏张籍的才华,与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作《赠张籍》、《调张籍》等诗,即使在卧病中还想念学生张籍,作《病中赠张十八》以寄情怀。

第三类是患难之交的友谊诗,在唐诗中也多有体现。儒家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痛恨“见利忘义”之徒。儒家这种道德至上的仁义观在唐友谊诗中有深刻的反映。柳宗元与刘禹锡因同坐王叔之改革集团失败之事被贬,“元和十年,(柳宗元)例移为柳州刺史。时朗州司马刘禹锡得播州刺史,制书下,宗元谓所亲曰:‘禹锡有母年高,今为郡蛮方,西南绝域,往复万里,如何与母偕行。如子异方,便为永诀。吾于禹锡为执友,胡忍见其若是?’即草章奏,请以柳州授禹锡,自往播州。会裴度亦奏其事,锡终易连州。”^⑦同是羁难之人,柳宗元尚能为朋友放弃自己的利益,用行动印证儒家“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⑧思想。柳、刘二人赴任途中在衡阳分别,柳宗元作《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重别梦得》、《三赠刘员外》,伤别之情,溢于言表。柳宗元逝世后,刘禹锡重过衡阳,写下《重至衡阳伤柳仪曹》:“忆昨与故人,汀江拆头别。我马映林嘶,君驹转山灭。马嘶循古道,驹灭如流电。千里江离春,故人今不见。”这催人泪下的患难之交,令人终生难忘。

当王昌龄被徙龙标尉之时,李白曾为此作著名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晚唐文宗大和二年,刘蕡应贤良方正试,在对策中猛烈抨击宦官,因而落选,后虽由令狐楚等的援引,终遭宦官诬陷,贬为柳州司马。李商隐对其遭遇感到惋惜、不平,写了《赠刘司户》,表示了自己的同情和愤慨。刘蕡死后,他又写下了《哭刘司户》二首和《哭刘司户蕡》,其中在《哭刘司户》一首中说到:“已为秦逐客,复作楚冤魂。湓浦应分派,荆江有会源。并将添恨泪,一洒问乾坤”。对友人之死怀着深深的伤痛和深深的不平。

第四类是诗友之间的友谊诗。儒家的择友标准是“朋友切切偲偲”、“友直、友谅、友多闻”,唐代诗人中有许多因互相仰慕才名或有着共同的文学风格、审美情趣而结为挚友或组成诗人集团,用诗歌往来酬和应答,表达相互之间的友谊。这类诗在唐友谊诗中占的比例也很大。李白与杜甫在洛阳相识后,曾几次一起漫游,结为忘年之交。李白给杜甫的诗在《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沙丘城下寄杜甫》等。杜甫给李白的诗更多,如《梦李白》二首、《赠李白》、《冬日有怀李白》、《春日忆李白》、《天末怀李白》等。白居易与元稹的友谊是又一著称于世的两位大诗人的

友谊,他们共同领导了新乐府运动,在志同道合中建立了深厚的友情。白居易作了多首诗怀念元稹,如《同李十一醉忆元九》、《赠元稹》、《立秋日曲江忆元九》、《暮春寄元九》、《劝酒寄元九》等,元稹也有《酬乐天》、《酬乐天见书寄怀》、《酬乐天劝醉》等诗作为赠答。白居易与刘禹锡也是文友,“禹锡晚年与少傅白居易友善。诗笔文章,时无在其右者……白居易尝戏微之云:‘……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仆不得独步于吴、越间,此亦不幸也。今垂老复遇梦得,非重不幸耶?’”^⑩刘禹锡有许多诗是讲述他与白居易的友谊的。李白与孟浩然也有着深厚的友谊,李白有诗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⑪并有著名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和《春日归山寄孟浩然》。这类友谊诗、元和体诗人的酬和诗,韩愈与贾岛、孟郊的友谊诗等等,在《全唐诗》中如飞花散雪,随处可见,风格各异,却一样深情。

当然这四类友谊诗并不是唐代友谊诗的全部内容,只是唐友谊诗的几种主要表现形式。虽然唐代是三教合一的时代,唐诗也受到释、道二教的影响,但从以上的各类友谊诗中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对其影响最大。因为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友谊没有道家的虚无,也没有佛家的超脱,而且具有积极入世,刚健自强、因以人本思想为指导而富有人情味的特色,从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儒家宣扬的“忠、信、义、礼”的影子。唐友谊诗中表露出来的真诚、深挚的情感也不是唐以前各代诗歌所可比拟的。

二、儒家思想与唐友谊诗的交融

中国文学受中国哲学的影响很深。中国古代的许多文学作品都反映了不同的哲学思想。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哲学思潮的主流,没有一种另外的哲学思潮取代过它的地位。唐代的哲学思想不止一种,但主流还是儒家思想,唐代友谊诗也就不能不受这种思想的制约和影响。

唐开国统治者鉴于前朝灭亡的教训,用仁政治天下,积极提倡儒学。《贞观政要卷一·论政体第三》云:“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理国,多劣于前古,何也?’对曰:‘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理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并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焉。”《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第二十七》也记载:“太宗初践阼,即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学士,给以五品珍膳……”《新唐书卷三·高宗本纪》又载:“乾封元年正月辛卯,幸曲阜,祠孔子,赠太师……总章元年四月己卯,赠颜回太子少师,曾参太子少保。”武则天以后,唐三教讲论进入全盛,促进了三教的互相融合。所以,唐代这种统治阶级上层提倡儒学的社会风气自然影响了唐代大批文人,而且在唐代的科举考试中还增设了“明经”一科,有时又增“帖经”。可见唐代对儒家思想的高度重视。这一切使唐代文人的生活从其少年时代起就沉浸在儒家哲学的氛围中,使士人从思想上对儒家精神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虽有些唐诗人历经生活的磨难而最终对儒家思想产生怀疑,但其青年时代都是儒家的忠实信徒。即使在壮志未展对儒家思想感到失望时,在行为表现上不乏还是一个儒家文人。如杜甫给其友郑广文的诗中曾说:“先生早赋归去来,石田茅屋荒苍苔。儒术于我何有哉?孔某盗跖俱尘埃。不须闻此意惨淡,生前相遇且衔杯。”尽管人生的种种不平使杜甫为儒术不兴而伤感,而失落,但他忧国忧民,为人民的痛苦大声呼号的精神,还是被公认为典型的儒家诗人。

唐友谊诗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友谊诗中有着儒家的许多观念,然而,唐代友谊诗并不是对

儒家思想的简单注释。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哲学是理性的观念的东西,诗歌是“缘情而发”的感性的东西,儒家思想作为唐代文人的思想观念对友谊诗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但唐友谊诗不同于魏晋玄言诗,不少的玄言诗是用诗的形式对玄学的简单而枯燥的注释和讲解,而友谊诗是在其表达真挚友情的字里行间渗透着儒家思想,它不是对儒家思想的注释,而是在儒家观念的引导下的感情表达,具有诗歌“缘情”的特色。情是在一定理性的制约下的感性表达,儒家又特别讲求理的制约作用,“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①而情之所以为情,是它区别于理性的感性抒发,不是对理的注释和讲解,否则,情也就不成其为情了。唐友谊诗也是这样,它不是对儒家思想的单纯直观的感性讲述,而是在诗中通过表达诗人对友人迁谪而难过、为思念友人而痛苦、为得到知音而欣慰、为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而鼓舞的种种感情,体现儒家交友之道的精神,体现儒家“仁、义、忠、信”的主旨。孟浩然曾在《洗然弟竹亭》中说:“吾与二三子,平生结交深。俱怀鸿鹄志,共有鹤鸣心”,这里没有直接说儒家的友谊观是什么,而诗中所表现出来的交友原则是“俱怀鸿鹄志。共有鹤鸣心”却体现了儒家“达则兼济天下”、“友多闻”的交友标准。白居易与无稹分别曾作《同李十一醉忆元九》:“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凉州”;韦应物在滁州刺史任上,写有《寄李儋元锡》:“去年花里逢君别,今年花开已一年。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两首诗都是对友人深沉的思念和悠长的牵挂,这种真诚的几近于伤感的友情的表达不带有丝毫理性的色彩,然而,我们可以明显地从感觉到儒家“与人忠信”的思想。这里没有关于儒家交友思想的讲解,而诗歌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却正是儒家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感性体现。又如杜甫的《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韩愈的《醉留东野》:“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离别何由逢”等,诗中那种为找到知己而产生的不是弟兄胜似弟兄的友情,其中又何尝没有儒家思想的体现!

儒家思想作为一种理念,友谊诗作为一种感性表述,二者不是截然分离的,更不是对立的,儒家思想就象糖溶于水一样溶解在唐友谊诗的感情中,不能被直观感觉到,却又无处不在。纵观唐友谊诗,几乎没有一首直接阐述儒家思想,或者借友谊诗的形式来阐述,都是把儒家的信念消溶在友人间或悲或喜的感情中。所以儒家思想与唐友谊诗不是水和油的关系,而是水和乳的关系,协调无间地交融在一起。

注释:

①《论语·学而》 ②《论语·子路》 ③《论语·季氏》 ④《论语·子路》 ⑤《论语·卫灵公》 ⑥《唐才子传》卷二 ⑦《旧唐书卷一百六十·柳宗元传》 ⑧《论语·里仁》 ⑨《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刘禹锡传》 ⑩《过襄阳遇孟浩然》(李白) ⑪《论语·阳货》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中文系)

责编 张 琴